

汶川羌族文化略论

◎ 冉光荣

【摘要】四川汶川区位特殊，生活于此的羌族，其本土古文化底蕴厚重。羌族本土文化在持续发展过程中，又受到汉、藏、回乃至西方文化的影响，因而在民间信仰、节庆活动、建筑、手工艺品及文艺等方面，出现了新的色彩和因素。

【关键词】汶川；羌族；文化；发展；概况

【中图分类号】K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139(2011)05-0066-7

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在岷江上游原冉駹地区设置汶山郡（约今四川都江堰市西北至阿坝州松潘县中部），辖绵虬、湍氏、广柔、汶江、蚕陵五县。较之其他四县而言，绵虬县之命名甚为奇妙。《蜀中广记》称“虎有角曰虬，行水中，地有此兽矣。”以为是因产此异兽而名县。但“虬”之存没文献记载，应该是当地部落的一种图腾崇拜物^{〔1〕}。汉王朝予以认可，亦证其虬崇拜影响甚大。此后“绵虬”二字传承下来，确属一种罕有现象。东汉时置绵虬道，蜀汉时改名汶川县，汶川县

名正式见之于史。晋武帝咸宁元年（280年）改称汶山县，梁时再改汶川县，以后汶川县名持续至今。唐时汶山郡改称茂州，汶山郡之名退出历史舞台。在岷江上游地区，西汉所置汶山郡及湍氏、广柔、汶江、蚕陵等县，因时势变迁，不复存在，唯汶川、绵虬之名得以延续，历时达二千余年之久。可以说汶川、绵虬已成为岷江上游地区的一种历史符号，是古老汶川郡及其所辖之县历史信息的有效传承者，也是岷江上游区域文化的具体体现。由此可见，给予汶川县以更多关注，尤其是

〔作者简介〕冉光荣，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四川 成都 610064。

如何克服诸多困难,对各县羌族及其文化进行更加深入研究,是学术界责无旁贷的任务。本文意在立足汶川本土古文化底蕴、汉藏等族文化影响的前提下,认识汶川羌族文化的新色彩、新因素。由于资料所限,仅能做简单勾勒,望同仁多加指正。

一、本土古文化发育

汶川本土古文化的发育,为汶川羌族文化成长奠定了良好基础。

汶川地处成都平原与西部山区的结合部,是岷江民族走廊带的民族文化与成都平原文化的交汇区,导致本地古文化甚为发育。

考古资料表明,汶川新石器遗址较多。如威州姜维城文化遗址有新石器晚期石器,以及夹砂红陶、红衣黑绘彩陶等器物,距今约五到七千年。尤应强调的是,汶川在玉器方面成就突出。该县龙溪河谷是龙溪玉原产地,早在公元前四千年前龙溪玉已被作为礼仪玉器传入中原仰韶文化。陕西汉中龙岗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27件玉石器中,经鉴定有23件为龙溪玉。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出土的大量祭神用及礼仪性古蜀玉器的玉料,亦主要是龙溪玉^[2]。此外,石棺葬文化(约春秋战国时期)遗址更属丰富,威州、克枯、龙溪、雁门、绵虬等地均有发现。

以上资料业已表明,汶川本土历史悠久,文化发展水准较高。对岷江上游而言,汶川是该地区成熟文化的代表,同时还具备了对外发展与开放的活力,向南是成都平原古蜀文化的重要源头之一,向北则是最早传入中原的四川远古文化之一。

在此要进一步指出的是,此后的历史表明,汶川古文化在沧桑之变的洪流中,其传承未被中断,尚能保持继续发展的势头。

姜维城遗址中,有大量汉代、唐代及明代的陶器、瓷器残片;在其它地方还有不同时期的墓葬遗址,反映了从古蜀文化到明清时期的地区发展历史进程。

如龙溪、克枯、威州等地的汉代崖墓,属西汉

时期石棺葬文化系列。其墓依山开凿,有的墓室有头龕、侧龕之分,个别的有二层台和后龕,具有较高发展水平。在姜维城有西汉末年之砖拱墓,所用之砖均有花草、动物、棱纹等浮雕纹饰,石卷拱亦刻有浮雕,可谓精致。在克枯等处,亦有东汉花边砖石墓存在。

姜维城、绵虬,还有西晋砖石墓的发现。墓为穹隆顶,以楔形砖券拱。墓壁以长方形花边砖砌成,以小青砖铺底。墓砖有几何纹、线纹、乳丁纹,其中竟刻有“太康六年(285年)九月吉日造作”的铭文砖。不仅填补四川晋代砖石分布的弱环,更表现了当时汶川砖石墓的建造水准。

明代墓葬在玉龙等地也有存在,内有木、石质“地券”、上釉谷仓陶罐等实物,成为反映当时农业生产状况的重要资料。至于清代大型石室墓存在亦多,有的还是葬有数代人的家族祖墓地。

以上资料表明,汶川在西汉以后社会持续发展、文化脉络未曾中断的史实,评价汶川富有历史底蕴的这一定位是能够成立的。这样的历史条件,对于羌族文化的成长,当然会具有促进作用。

二、汉、藏文化的全面影响

1、汉文化

汶川羌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受到了汉、藏文化的全面影响。

据1949年汶川县人口资料,汉族占72.0%、羌族占19.9%、藏族占7.5%、回族占0.48%。就分布而言,羌族聚居于龙溪、克枯、雁门、威州、绵虬等地的高半山地带。汉族人口占压倒优势,其中少数精英掌握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权力,而大多数汉人从事农耕与小型商贸,与羌族杂处,交往频繁,通婚亦多,故其影响极为广泛。

岷江为川西重要通道,汶川又当岷江、杂谷脑河交汇处,系成都进入川西北广大民族区之门户,享有“汉番咽喉,西路命脉”之誉。历代中央王朝均甚关切,在其境多置关、堡、墩、台等以资控制。如雁门过街楼为唐时通鹤军城地,明时设雁山堡。龙溪亦在宋时设军城,明时设堡。威州

地形因东有围顶山,东南有玉垒山,西有阳龙山,兼之岷江、杂谷脑河汇聚,形成“三山雄秀,二水竞流”之势,更为时人注目。在玉垒山便有题刻三则,一为“玉垒山”,传位蜀后主所书。左下为“三定诸蛮”,右下为“三山熊秀”,均突出其军事价值。

作为县城所在之威州、绵虬,明代已筑工程浩大之坚固城墙。威州城墙依山盘曲,险峻壮观。至今尚存的西墙长30米、高9米、宽1—1.5米;东墙呈凸状,长55米、高10.2米、厚5米。绵虬城墙为石砌双层夹墙,中夯筑泥石,甚为牢固。残存墙体高4.6米、顶宽2.4米。两者堪称中国西部地区古城墙的佳著代表之一。

正是出于政治、军事的特殊需要,中央王朝对于汶川统治日趋强化,并有一些新的举措。如南宋孝宗乾道十年(1171年)在土司土兵之外,专置土丁200名,由汶川县发给每人月米三斗。因生计得保,训练有素,致骁捷可用。其后推行的改土归流亦较彻底,明时除瓦寺土司十七寨外,全县分置五里。清代则将瓦寺土司二十八寨外,合并为二里。咸丰时为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大办团练,乃在绵虬、映秀、龙溪、过街楼各办一团,下辖甲、设保正,与内地汉区基本一致。

与此同时积极推行教化,在文化教育、宗教信仰方面作出了诸多努力。据民国《汶川县志·学校》载,汶川在唐代已经兴学。南宋嘉定十年(1223年)威州人谢方叔中进士,后官至左宰相,封惠国公,成为杰出人材。明代时汶川儒学更得发展,洪武十五年(1382年)建威州学宫,嘉靖二年(1523年)建绵虬学宫。清代更在科举考试作出羌民不仅“考试等事悉与汉民一体办理”的新规定,还特别出台了维护汶川本籍考生权益的办法。据《批准评定〈汶川学籍非土著禀生不得保结非土著人氏不得应试章程〉碑记》载,嘉庆三年(1798年)汶川县令根据汶川科举考试中冒考严重,为保护本地考生权益,颁布了科考的应试章程,并立碑示禁。羌族子弟可以通过科举进入仕途,当然会进一步激发他们的入学热情,汶川

兴学亦得发展,汶川书院(1760年)、信者秀书院(1828年)相继建立。在此必须指出的是,清朝皇帝对汶川教育颇予关注,多次颁给御书匾额。如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的“万世师表”,雍正四年(1726年)的“生民未有”,乾隆四年(1739年)的“与天参地”,嘉庆九年(1804年)的“圣集大成”。这确为一个西部民族地区小县带来了难得的声誉。

跨入近代,汶川小学教育亦显示特色,不仅建校数多,如1937年有45所,为岷江上游一时之最,而且有的小学还立有校训或类似校训的办学宗旨。如民国十四年(1925年)私立广益学校内有一匾额称“广其智慧聪明还宜孝经先入手,益我身心性情须知恕字要留神”,突出了传统思想与近代教育理念的有机结合。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水磨兴仁小学正式提出校训“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可谓简单明白。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威州小学在新建教学楼门下顶书“卧薪尝胆”。时值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此激励学生报国决心。这些校训或办学宗旨,立意高远,更具时代性,表现了汶川小学教育向更深层次思想境界的追求,应该是非常可贵的。

宗教方面。中央王朝出于政治需要,兼之毗邻汉区,除羌族民间信仰外,汉地佛教、藏传佛教、道教、伊斯兰教,乃至国外基督教在汶川均有存在,是岷江上游宗教最发育的地区。

汶川汉地佛寺,三国时在三江水磨交界之宝顶山已建盘龙寺。唐代威州有仁寿寺、映秀有涌山寺等。清代晚期羌族、藏族地区也建有观音庙。此外还有一些佛教石刻,如唐代“陀罗尼经幢”、宋代“接引佛”。银杏佛堂坝有两龛摩岩佛像,一为桃状,内有一佛立于莲花山;一为长方形,内系观音像。此为宋代民间自成佛摩崖造像,可证其时佛教信仰颇盛。在漩口有宋代道教石刻发现,至明代万历年间,水磨所建黄龙寺已有盛名。现存绵虬真武宫结构严谨,是岷江上游最完整的道观之一。在威州、绵虬、漩口回族集居较多之地建有清真寺,其中威州清真寺历史较长。

基督教进入汶川时间较晚,1916年英国教士陶然士受美国圣经会指派,在龙溪建立羌区第一所福音堂,而后在绵虬、威州亦有兴办。先后有羌民127名、汉人9名接受洗礼。他除传教外,还传授养牛新技术。此外,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中华基督教全国边疆服务部在威州建立诊所,1945年扩大为医院,是汶川历史上第一个医院。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该部与威州岷江流域林管区合作,在萝卜寨等开设苗圃,进行核桃、松柏、榆树、榕树栽培技术培训,进行良种玉米种植实验。同年还与汶川县政府在萝卜寨合办汶川县立边民小学校。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边疆服务部在雁门、克枯等地,首次使用农药预防黑穗病。次年在威州开办牲畜改良场,繁殖牛、羊、猪、鸡等良种^[3]。

佛教、道教、伊斯兰教的存在,丰富了羌族大众的信仰内容,当他们对上述宗教有一定了解进而信仰之后,出于宗教情结,在思想上对汉族的认识会更加全面、深入,对汉族文化会持更为认可甚至接受的态度,这极有助于双方的融洽。至于基督教虽然进入时间不长,但其在传教、办学、治病及科技推广等方面的活动,适应性、渗透性颇强,让羌民知道了不少新鲜事物,增长了见识,自然也有助于羌族与其他民族间的共处。

2、藏族文化

汶川岷江西岸的草坡、卧龙、三江原本有藏族居住,但对羌族产生更直接影响是在瓦寺土司出现之后。明英宗六年(1441年)西藏雍中罗洛思部奉诏率土兵三千一百五十余人、头目四十三人来汶川镇压“番乱”,事后授予六寨留驻汶川涂禹山。神宗万历年间因平草坡之乱又授十一寨。清顺治时主动降附,更被封宣慰使,再获耿达、卧龙、三江十一寨,共计二十八寨,成为羌区最大土司。

瓦寺土司本是明王朝将远在西藏的雍中罗洛思部调至汶川后加封的,也是羌区的唯一藏族土司。这种特殊状况促使其统治表现了一些不同点:

第一,对中央王朝力表衷心。如清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去西藏抗御廓尔喀入侵,千总刘正祥阵亡,都司王保以战功被赏三品项戴,并委松潘参将。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英军攻陷厦门,土司率土兵4千余人赴浙江前线。“矫捷奋勇,战辄争先”,土守备哈克里等战死。在三江有专葬阵亡者的“发辫坟”。

尤为可贵的是,辛亥革命前夕,瓦寺土司主动参与推翻清王朝之斗争,在境内收集钢、铁赶制武器,率兵配合四川保路同志军进攻县城,其后连续进军灌县、郫县等地,因功被委屯土统领。1950年汶川县人民政府成立,瓦寺二十四世土司之妻索赵士雅拥护、支持土地改革,为阿坝州各族上层人士做出榜样。事实表明,民国时期瓦土司获“世世忠贞”之美誉是恰当的,完全算得上中国土司中之表率。

第二,缓和统治关系。鉴于统治区绝大部分是羌族,为求平稳,以原羌寨为基层建制,各推寨首负责本寨事务。除涂禹山三寨以外,余二十五寨设五个总管分别管理。关于羌民的差役负担,从《瓦寺土司差役碑》所见,除规定项目外,也有一些新的变动。如减少交纳量,“每年所上贝母五斤,减让一斤,只上四斤”。减少劳役量,“土民伙种印主官田十九石种内,土司让免二石五斗种不耕。”给予生活补贴,“土民耕种官田,每日一人赏发荞麦饼一个,重一斤。”减少跟班,土舍原用二名,现只用一名,“土舍子孙不得私增”。此碑立于土司官寨,昭示羌民,内容具体,为羌区所仅见。

第三,倡导藏传佛教。藏族在向外扩展中,藏传佛教是其必须利用的精神武器。明英宗正统九年(1444年)雍中罗洛思进贡大藏经一千零二十部,既是向明王朝表示忠诚,也是在羌区推行藏传佛教的信号。汶川藏传佛教寺院之代表当属草坡金波寺,建于明崇祯年间,清乾隆时重修。该寺拥有土地、牲畜、房产收入,每年正、四、六、八、十月均有祭祀活动。此外三江、卧龙亦有寺庙,清光绪年间三江藏传佛教寺庙重修时,土司本人亦被神化,其塑像在寺中加以供奉。

瓦寺土司在汶川历时五百余年之久,其间藏羌、藏汉关系虽有激烈之时,但总的说来还算平稳,相互交融,生活习俗中也出现了一些新现象。如羌族民居中吸收了藏族建筑的因素;藏汉、藏羌通婚;藏族婚俗也渗杂羌族的内容。草坡藏族丧葬也受到了汉族影响,只是在仪式中不说汉语。正是如此,瓦寺土司在岷江上游、四土地区颇具实力,如继承卓克基土司位。该土司在卓克基发展生产,改善藏汉关系,在民主改革中更是主动靠近人民政府,成为四川藏区土司中的先进代表。

三、汶川羌族文化的新色彩

1、民间信仰与节庆活动

由于汶川的特殊区位,历史文化底蕴厚重,兼之受到汉、藏、回等文化,乃至西方文化的多方面影响,汶川羌族文化表现了一些新色彩、甚至新因素。

关于民间信仰与节庆活动需要注意两点:

一是对汉族等文化的吸取。

例如佛教信仰,汶川羌族普遍信奉观音,认为她大慈大悲、救苦救难、无事不明、无事不管,故建大小观音庙较多。汉文化对节庆的影响,在不同地区有不同表现,有的成为当地重视或专有的活动。如雁门土主会。过街楼川主庙建于明成化十年(1474年),为今阿坝州现存最早的川主庙。每年农历正月十二举行川主会,张灯结彩,宰杀三牲,抬护法神游行,以求平安。漩口清醮会。每三年一次,亦在川主庙举行,为时三天,祈求太平安康。映秀英华老祖会。农历正月十三日映秀及漩口之民去黄家树山英华老祖庙祭祀,并有素席招待,盛时达千余人。城隍会,此会参与者众,汶川有城隍庙四座,威州、绵虬各一,并非县衙所在地之龙溪竟然有两座,可谓稀奇。每年农历五月初十举办城隍会,规模盛大^[4]。

二是羌族传统民间信仰、节庆活动仍然保持、传承。民国时期,羌族民间信仰的巫师即释比,得到了县政府的格外尊重。每年立春前一日要专门

举行迎春大典,县官主持,迎请释比在县衙大堂、二堂、三堂唱经作法(俗称“打鼓鼓”),以祈求丰收。仪式后发给钱、酒以为奖励。在汶川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及基督教的发展中,羌族民间信仰、特别是释比地位得到认可、推崇,当然会让羌族大众及释比本人受到鼓舞,以致汶川释比不仅数量较多,且名巫辈出,保持了颇大影响力。该县龙溪、尤其是巴奔寨,即以巫师、巫舞享誉羌区。阿尔沟村寨中祭山石塔甚多,当地释比传统作法仪式亦保留最为完整^[5]。

于此同时,在释比经典的传承方面也做得较好。“三坛经”在龙溪、绵虬、雁门均有保存。羌族释比原本分为十二派,师承一人,互不交流。三地释比称谓也不尽一致。龙溪释比祖师称“十打齐莫”,自称“比”或“诗卓”;绵虬祖师称“阿爸木拉”,自称“许”;雁门祖师称“阿爸锡拉”,自称“许”,尊称“比”^[6]。在这种状态下,靠口授传承经典难度极大。但三地却能基本保存下来,内容稍有不同,如雁门三经在请地盘业主(昔日羌族祖先的势力范畴)时,说到了灌县、郫县、成都的地业祖名。如果把三地经典互相补充印证,可以发掘羌族古史的一些新资料,这应当是对羌族文化的可贵贡献。由此可以认为,汶川羌族民间信仰在吸取汉族等外来宗教文化因素,丰富自身信仰的同时,其传统民间信仰也得到应有的保持与传承,这是令人十分欣慰的。

2、传统刺绣工艺

羌族刺绣极具盛名,纹饰繁芜而富美感,其成功要素之一是对汶川古文化内涵的充分消融和精巧再现。在雁门羌族妇女的衣领、衣襟、袖口、托肩等处所绣文饰,既是威州姜维城遗址内出土的彩陶片纹饰的变异,又与这一带的石棺葬文化中的陶罐口沿下颈部与肩部的装饰压印纹极为相似,她们把这种纹饰直接称之为“缸钵边”^[7]。也就是说,汶川出土的古陶器纹饰,给羌族妇女的刺绣带来了重要启迪与灵感。与此同时,羌族刺绣也吸取了一些汉族内容,如“二龙戏珠”、“麒麟送子”、“和合二仙”、“鲤鱼跳龙门”等含义吉祥

的图案。

此外,汶川羌族衣饰表现了一定的地域性。如龙溪式,妇女包黑、白头帕、帕端饰花。上衣喜玉蓝色,前襟短及腰,后襟长及膝,外套布坎肩,系黑底饰黄花围腰和花腰带。又如绵虬式。男子穿短衫黑裤,打绑腿。妇女包头帕,穿小领大襟或对襟长衫,多套坎肩。纹饰图案针法细腻,色彩鲜艳,与此同时汉装长短衫也较流行^[8]。力求个性化,表现了他们对服饰美感与舒适度的不同追求。

3、建筑、索桥

民居

汶川大型或重要的建筑,如衙署、庙宇、学宫、塔阁、土司官寨等,都是汉式建筑,受其影响,羌族民居也不同程度接受了木石结构、木结构、屋面坡顶、盖青瓦、开窗户等建筑要素。尤其在汶川南部多雨之区,在原平顶上加汉式坡顶,穿斗结构,盖以青瓦,显示了某些川西汉族民居的风采。

在与藏族毗邻的羌族民居中,其窗户多采用藏族传统建筑特点之一的“U”型窗形式。再如墙的处理上也使用当地藏族在墙角上翘成角状的做法^[9]。

就汶川羌族传统民居建筑而言,萝卜寨具有明显特点。此寨处羌区少见的山原平旷台地上,因土多石少,不再以片石砌墙,而用黄土版筑单层或双层土屋。兼之地面宽阔,民居达二百余户,家家相连、户户相通,同时,又有若干巷间纵横其间,成为羌区第一大寨,并享有“云朵上的街市”之誉。因此之故,萝卜寨总体面貌为之大变,完全表现了一种新的建筑风格,成为整个羌区民居建筑的另一个代表。

高碉

汶川羌族对于岷江上游著名的“邛笼文化”作出了特殊贡献,这就是在石碉之外创造了泥碉。位于县城北三公里布瓦山的布瓦寨泥碉群便是典型代表。其墙体以黄土夯筑,平面大多为方形。碉底边长4.5米、墙厚0.45米、门高2.1米、宽1.6米,

整个高度在18—23米。较之石碉略矮、墙体稍薄。泥碉顶部为木结构斗拱建筑,具有古碉风格。泥碉之产生,系因布瓦山由黄土累积而成,鉴于石块缺乏、取土便利的客观条件,当地羌民不拘惯例因地制宜以泥筑碉,导致了羌碉技术的新突破。布瓦泥碉耸立山脊,为威州之制高点,军事价值突出。另在克枯木常寨也有一土碉,平顶五层,高20米。碉基南北5.8米、东西5.2米,墙厚0.27米,较之石碉同样要矮、墙体要薄,当地之石碉27.32米、墙厚2.80米。

汶川传统石碉中,有阿尔寨长形碉、簇头锥形碉、龙溪布兰碉为台阶式。形式多样,亦有特色,表明汶川高碉建筑在羌区达到了较高水准。

索桥

又名绳桥,古称“笮”,汶川羌族将岷江上游著名的“笮文化”推向了顶峰,其标志就是威州大索桥的建造。此桥传说始建于唐,史载见于明洪武元年(1368年),全长100余米、宽1.5米。南北立有24根大木柱,以20根粗壮竹绳为底,上铺木板,左右以两绳为栏,每丈贯以木棒为柱,以便把扶行走。大索桥负重力强,横跨江面,极其壮观。另在绵虬有上关索桥,又称铃索桥,长160米、宽2.7米,亦属杰作。

索桥每年小修,三年大修。此系周边羌寨之神圣义务,男女老少共同劳作、共同饮食、共同娱乐。大修之期常达数月之久^[10]。索桥是羌族人民的智慧创造,不仅具交通功能,而且也是组织、动员、教化羌民的一项重要社会活动。

4、文艺

羌戏

汶川羌寨中有“羌戏”的存在,又称“寨子戏”。据有材料载,1945年龙溪天旱求雨,在请汉族戏班唱戏四天的同时,也唱寨子戏三天。1957年萝卜寨羌戏曾参加参加阿坝州文艺调演。从有限的材料中可见,羌戏中的释比戏分上、中、下“三坛戏”,共72部,内容为颂祖、驱鬼、求雨等。表演形式有说、唱、跳,伴奏乐器有羊皮鼓、羌笛、口弦、唢呐、胡琴、月琴等。有人认为,羌戏类似

重庆市东部靠近湖南、湖北一带的傩戏，属于原始戏种^[11]。有关羌戏资料极其匮乏，研究更是空白，需要作出新的努力。

花灯戏

清代中叶后，汉区艺人来汶川定居，将其艺术相继传入，其中便有花灯戏。而后渐与羌族传统歌舞结合，乃有具羌族特色的“羌族花灯戏”的产生，曾在雁门等处流行，为羌族文艺增加了新内容。

5、民风

汶川羌族民风变化甚大，尤在家族及社会活动方面表现突出，处于羌区前列。

自改土归流后，羌族不断采用汉姓，有的姓氏壮大起来，开始撰写族谱。如绵虬的汪、王、高、苏；龙溪的余、何、兰、陈、黄、马；克枯的赵、王、张、蒲；雁门的朱、袁、赵、刘、尚；威州的余、毛、郭、朱、任等姓，均各有族谱。为了维护本族声誉与发展，纷纷树立族碑。如三江刘氏、威州毛氏、雁门袁氏、漩口姚氏、绵虬董氏、何氏、高氏、郭氏等都在祖坟处立有族碑。内容为述先祖艰难创

业，子孙应继续努力，光宗耀祖。三江照壁刘氏百代兴隆碑，为清嘉庆八年（1803年）立，记三江羌氏刘氏家远祖从明隆庆四年（1570年），至嘉庆八年233年间九代人的班辈姓名。这不仅是研究羌族姓氏变化的可贵材料，也充分表明羌族重视自身谱系，不忘本源，以求发达的心态。并学习汉族作法，克碑为据，以表神圣。

值得注意的是，汶川羌族在强化家族活动的同时，各“房名”仍然继续存在，各家通过房名得知根本。埋葬祖先的“火坟”，每年清明各家都要先去祭奠，然后再拜家坟^[12]。羌族传统得以维系。

此外，银杏光绪十八年（1892年）所立墓碑中有记录两年前“天降洪雨，……数千余年之墓尽赴江中”之惨状，意在警示后人注意天灾之突发。雁门光绪十六年（1883年）所立乡规民约碑，共三条414字，要村民共同遵守、共同监督。克枯小寺寨光绪四年（1817年）立有禁止盗伐林木碑。这些零星资料一定程度上说明汶川羌族社会责任意识的增长，自身素质的提高。

【参考文献】

- [1] 汶川县志[M]. 民族出版社, 1992, 77.
- [2] 汶川博物馆历史文化展览文本[M]. 7.
- [3] 耿少将. 羌族通史[M].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 382.
- [4] [8] [11] 羌族辞典[M]. 巴蜀出版社, 2004, 391, 366, 305-306.
- [5] 邓廷良. 羌笛悠悠[M].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9, 25.
- [6] [12] 汶川县志[M]. 民族出版社, 1992, 782, 770.
- [7] [10] 徐平. 东方大族之迷[M]. 知识出版社, 2001, 239, 121.
- [9] 季富政. 北川城镇建筑风貌研究[M]. 107.

（责任编辑 张 斌）